

无色处有繁花

□ 虬田

初夏的福州多风多雨,风呼呼啦啦,雨霖霖啪啪;风拉拉扯扯,雨敲敲打打。风雨配合默契的一番操作,改变了蓝花楹的状态,让它们一夜之间绽放出紫色的花朵。

看惯了桃红柳绿、黄菊兰白,突然在这风雨迷蒙的季节里,半空中倏地蹿出一树的紫色,甚为醒目。可它们多为“散兵游勇”,像被人无意中种错了似的,东一棵、西一棵地杵在闹市里,难觅成排成片的壮观景象。

这时的大根路就显得特别“豪横”了。这条以“大”命名的路实际上严重地名不符实,因为两边楼房以筑高墙的方式与道路划分了界限,毅然决然的态度,不仅容不得一丝懈怠,也容不得丝毫商量的余地。随着时代的变迁,两边的楼房越“长”越高。挤进阳光的时间越来越短,光条越来越细,铅灰的色调却越来越深,已然成为绝对的统治色调。无法错车的大根路只得沦为单行道,路两边却慷慨地种上了蓝花楹,且不论高楼如何起,斤斧始终未敢伤此树。这些蓝花楹似乎很理解脚下的逼仄与生命的可贵,树干尽力缘墙而上,一跃过墙头,便如一颗青葱的脑袋,呼呼地炸开满头的秀发般,枝叶无拘无束地四射开来,既遮住了身下的路面,又显示了蓬勃张力的张力。

大根路周边的绿化树,以榕树、芒果树和香樟树为主,它们棵棵亭亭如盖,四季常青,形成这个区域的底色。在花未开的日子里,蓝花楹的样子既比不过榕树的高大,也比不过芒果树的葱郁,更比不过香樟树的芳香。地心引力似乎特别垂青于它,将它的树干紧紧往下拽的同时,又使劲地拧了几下,那厚厚的树皮跟着受累,被拽得七扭八歪,只得歪歪扭扭地沿着树干爬上去,一路向上,一路开裂。

这些深阔的树皮裂缝,轻轻松松地收容了那些从天飞来的蜈蚣草和榕树籽,它们在树皮的庇护下发芽生根,坦然地结束了飘零的日子,在这里安居乐业。一春一夏,细嫩的枝叶便在蓝花楹枝干上肆无忌惮地招摇。在无花无叶的日子里,让人感觉蓝花楹的生命似已被它们代替。

当老干虬枝吐出一团团绿时,蓝花楹不仅宣示了它顽强不屈的生命,还有了盆景的味道。只是,路上的行人步履匆匆,哪能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地仔细欣赏它们,用心感悟它们在时光打磨和环境挤压下,成为妙手偶得的天然盆景呢?

地铁4号线开通后,路人的脚步目的更加明确了,掐住时间穿过大根路北端,径直下到地铁站点内乘车,直奔向各自的前方。

忙碌使人健忘,蓝花楹却和季节信守承诺,初夏的风乍暖还寒,雨还凄凄冰凉,那一朵朵紫色的花便如期绽放,朵朵花儿规整地插在花枝上,宛若少女头上梳成的一缕缕发辫,纹丝不乱中透出一股勃然的英气。这些花又都开在枝的最高端,霎时,一枝枝花就像被高高举起的千万支火把顶上闪耀的火苗,凌空跳跃,璀璨夺目。大根路两排蓝花楹因为集中成簇,开得尤显浩荡,棵棵树上难以计数的点点紫光,将路上、墙上填得满满当当,犹有“函谷东来紫气高”之势。

蓝花楹的奋力一开,将平常变成神奇,从而打开了人们的记忆。物和人是如此相似,大多数的物与人大多数时间归于平凡。但平凡却不平静不平庸,在默默无闻间积蓄力量,于时机到来时展露非凡,将内在的能量转化为外在的价值,呈现大美大能大用,也由此令人刮目相看。就像那一朵朵紫艳艳的蓝花楹,恍若夜空流落的星光凝结在枝头,似乎玛瑙珠玉随雨滴串在枝头,又恰似夏风携来的远海浪花,天然惊艳。

地铁4号线将远处的人们拉到这里。紫色的美艳花朵进入人们的眼帘,也进了手机、相机,并传向四面八方。大根路的蓝花楹便再次成为网络的流量和人们口中的“热词”。看这叶茂花繁、雄姿英发的样子,猜想明年境况亦然,心情也不禁舒朗了起来。

1934:曾志上社洋

□林思翔

社洋地处宁德蕉城与福安交界的山坳里,属蕉城赤溪镇管辖。从镇区驱车出发,就一直在山中盘旋绕弯,一会儿是陡坡上下,起起落落;一会儿是林荫竹影,穿越环绕。一路上除了车轮转动,听不到别的声音,异常寂静。但有风声飘来,如同天籁。约莫一个小时后,就到达了社洋村。

群山环抱的社洋,海拔900多米,村不大,百余户,房舍高高低低地散落在山窝里。村后群峰高耸,浓密的林木和竹丛,在村子周遭围起了一道厚实的屏障。因了这铁桶般的“围屏”护卫,村子田地上菜蔬青绿,老人们在房檐下悠闲地享受着阳光的绵绵暖意。这里南下蕉城赤溪和北上福安甘棠都得走20多里山路,山高地僻,人迹罕至,当年是个异常闭塞的小山村。

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山村,过去深受地主的压迫剥削。为了发动农民起来开展革命斗争,拯救农民于水火,1934年,担任福安中心县委领导的曾志曾来到社洋。至今,90年过去了,当地人民依然念念不忘。

社洋地处高山,本来耕地就少,可有限的土地多数被地主所占有,当地百分之九十以上农民无地或少地,靠租种地主土地过日子,受到高租重利的剥削,租额为“倒六四”或“三七”,地主占大头,农民占小头。这样,农民一年的辛勤劳动,给地主交完租就所剩无几了,佃户常常是“镰刀挂壁,锅底朝天”。遇上自然灾害的歉收年,佃户贴了种子、工本仍不够还租。农民日子过不下去,向地主借钱,先是“内加五”(借10元,立票15元),后以月息加二,本生息,息作本计算,一年未还,就翻几番,使农民永远还不起这债。

有压迫就有反抗。苦难深重的社洋农民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能,它与闽东许多农村一样,一旦火种点燃,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1934年2月3日,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给福安中心县委发出指示信,要求:“……依照党的土地纲领和苏维埃的土地法令,迅速地发动领导各乡贫农雇农与中农实行没

收和分配地主阶级土地的斗争。”

2月17日,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在福安溪柄甲厝召开扩大会议,会上讨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苏区实行土地革命,开展分田运动,由曾志负责起草《分田纲要》”。曾志1933年5月由福州中心市委调来闽东,参加福安中心县委领导工作。此前她曾在闽西参加过土改,经历过这项工作。很快她就把《分田纲要》草拟出来,并在福安柏柱洋搞试点,而后在闽东全面推开。

社洋紧邻福安甘棠,受福安南区农民运动的影响,这里的农民早就萌发了“斗地主分田地”的想法,群众基础较好。1934年2月的一天,受福安中心县委委派,曾志从福安境内前往宁德县安乐区社洋村,要把“土地革命”往南推进。

二月的闽东山区春寒料峭,阵阵山风吹得身上不停地打着抖瑟。路边的迎春花星星点点,绽开笑脸,吐着芳香。急于赶路的曾志无心多看,只埋头赶路。上岭,下坡,再上,再爬。面对这上上下下的寂静山道,曾志的思绪也像这路况一样上下起伏。她想到自己几个月前在秘密状态下来到福安。闽东白色恐怖严重,自己一个外地人,语言不通,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发现。而且在农村,村子小,房子杂,人来人往,秘密隐藏很不容易。加之又是个女子,经常还要同战士们一道行军打仗,多有不便。有时虽然化装成农村少妇,但进出村子也很不容易,危机四伏,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凭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自己在福安坚持了下来。想着想着,她不禁加快了脚步,翻过了几座山头,穿越几片原始森林,终于到达了社洋村。

这位讲“官话”的青春女子的到来,让村民们既惊讶又高兴。曾志就在贫农妇女杨嫩妹家中住下,与当地党员杨益学一道开展工作。她深入社洋各个自然村,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发动群众,把大家的革命潜能激发出来,组织贫农团,反对地主的剥削压迫。仅十来天时间,报名参加贫农团的人数就达适龄对象的90%以上。贫农团组织起来开展工作后,曾志奉命返回福安。

由于贫农团工作进展顺利,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安乐区委、区苏维埃政府先后成立,杨益学任安乐区委书记。曾志闻讯非常高兴,当即写了一副贺联:“政柄夺回天正晓,渠魁开却日方西”,派人从福安专程送给杨益学表示祝贺。随后,在安乐区委领导下,安乐区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了警卫连、游击队、肃反队、赤卫队等革命武装和贫农团、妇会、少年队等群众组织,革命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

那时,安德苏区敌我斗争形势非常复杂。这年3月17日,为了开辟安德苏区新的红色区域,把福安、宁德苏区连成一片,安德县委书记叶秀荃和县委军事委员、下南区苏维埃主席陈洪妹率领赤卫队80余人开赴与社洋毗邻的龟山。3月25日,不久前刚投奔革命的宁德县龟山大刀会在其头子林明益三兄弟策动下,重新投向反革命阵营。林明益在龟山以设宴“犒劳”安德县领导为名将骗入席,事先埋伏四周的刀匪一拥而上,大打出手,叶秀荃、陈洪妹奋起反击,但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赤卫队员除少数死里逃生外,大部遇难,72位烈士血染龟山。4月21日,闽东红军红二团红十六连在福安下南区赤卫队近千人的配合下,荡平了宁德龟山反动民团,将民团和刀匪200多人一网打尽,缴枪20多支,镇压了反动的林明益三兄弟,为在龟山死难的烈士报了仇。

社洋、龟山一带山高岭长、村落分散,土匪经常出没,人称“土匪窝”,虽镇压了一批,零星刀匪依然存在。1934年秋天,曾志再次风尘仆仆地来到这敌我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的深山腹地社洋村。

这次来,主要是领导农民进行分田。她进村后,首先召开各阶层干部和群众会议,宣传党的土地政策,介绍柏柱洋分田试点经验。在曾志领导下,社洋所在的安乐区至9月下旬分田结束,全区11个自然村、712户、2967人,每人平均分配一亩三分地,做到“土地还家”,实现了千百年来农民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和“土地谁种归谁收”的愿望,农民欢欣鼓舞。

岁月深藏的故事

□文卿

有时总会想,唐代诗人杜牧在写《江南春》,追忆几百年前南朝寺院之盛时,春风斜雨中,漳州的开元寺是不是正立于芝山山麓?

不知为何,这个念头突发又一直放不下。因为工作的缘由,每天在芝山下来往数趟。如果不追溯,都不知道脚下这一层一层的土地有多深厚。

“白衣苍狗多翻覆,沧海桑田几变更。”想必芝山早已改了形貌,但若从高空俯瞰,漳州当还是一千年前的样子,“大江南旋而东注,诸峰北环而回顾”。在现存福建第一部统合全境郡邑史之省志《八闽通志》中,漳州是“天宝、紫芝殿于后,丹霞、名第

拱于前,鹤峰踞其左,圆山耸其右”,还有“二江襟带”,指九龙江的西溪、北溪环绕,当真山清水秀。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朝廷敕令天下各郡均要建立开元寺。漳州府开元寺是什么时候建的呢?清江国栋主修的《龙溪县志》古迹卷载:“开元寺,在县治之北,唐嗣圣间建于漳浦,明皇二十六年改今名。贞元间,徙州治故移紫芝山麓。元贞贞年间重建,并西湖净慧院入之。”在成于明弘治己酉(1489年)的《八闽通志》中也有相似的记录,并载漳州开元寺的全称是“开元净惠万岁寺”,当时内有唐玄宗铜像。

公元738年,漳州州治还在漳浦,当地有一座建于唐嗣圣年间(684年)的寺院,诏书一到,这不知名的寺院就改名为开元观。唐贞元二年(786年),漳州州治迁到龙溪(今芗城)。贞元十七年(801年),漳州刺史李登奏移开元寺于登高山(即芝山)南麓。

文天祥到漳州的时候是宋景炎二年(1277年),他逗留了几个月,从元月至三月。据《宋史·文天祥传》中载,“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卫”。文天祥与元兵周旋,他驻师漳州时,曾住在开元寺,有《驻师漳州夜宿开元寺》一诗为证。“天涯有事恼寒宵,欢喜名蓝转寂寥。满目风烟迷法界,极天榛莽乱渔樵。包胥谩向秦廷乞,宋玉谁怜楚岫招。海国孤忠凭一旅,还祈佛力佑清朝。”从中能读出英雄报国无门之憾、力单势薄的无奈感。

夜深人静,士兵都睡了,文天祥无法入眠,起身在开元寺巡视。这时的开元寺已历几百年。古树参天,月光透过密密的枝叶,破败的禅寺更有几分幽深莫测。冷冷夜风

吹,飞檐下的风铃灵动有声,惊走了古藤上的几只鸟。“身世浮沉雨打萍”,文天祥心绪难平。即便这样,他还是勇赴国难,走上了风雨飘摇的抗元之路,其气节“精忠大节,亘赫宇宙”,“其浩然之气光日月而震雷霆”。

后来的开元寺是毁于兵戈抢攘,战火纷飞了吗?很有可能。在《左文襄公联语》中,左宗棠提芝山书院时写道:“咸丰三年,寺毁于寇,栋宇尚存者。”虽受损,筋骨还在,但清同治三年(1864年)十月,太平军入漳后,开元寺被“尽付一炬,僧徒逃散殆尽”。熊熊火光中,这座古刹是彻底没了。漳州开元寺,从此只存在诗意的想象中。

明代漳州诗人郑怀魁曾在《开元寺鲸音楼》中写道:“突兀飞楼迥入云,华钟高钮结重禁。前朝款识千年初,上界春容四地闻。”这似乎是某种穿越时空的印证。郑怀魁当年看到的是重建后的开元寺,耸立的楼高远入白云,大钟刻着华美的文饰,高高的屋架梁交错叠置,他也看到了开元寺中以前的祭器铸刻的文字。郑怀魁距离唐朝的时光是遥远的,恰如现在的我们,距离他所在的明代一般遥远。

开元寺被毁之后,左宗棠经过漳州时,适逢“漳人议修复试院,因令即寺故址为之”。据说若干年前,朱熹学生、人称北溪先生的陈淳曾提议将开元寺改建为试院。左宗棠因此戏称是“陈先生命我矣”。当然,试院最后也湮灭于烟云中。时间倏地一闪而过,芝山上及周围,那唐时的禅寺亭台、宋代的书院、清朝的试院、清末民初的新式学堂等,皆被岁月深藏,所有的故事皆已隐匿在土壤中,层层叠叠,静静安眠,唯有从故纸中才能寻得了。

